

巴蜀地区摩崖佛寺的流变*

郭璇

(重庆大学 建筑城规学院, 重庆 400045)

摘要:摩崖佛寺是佛教石窟寺的晚期形态,是石窟寺传入中国后在中国本土文化及建筑体系的影响下其空间形态由封闭逐渐走向开敞的这一历史进程的产物。从石窟建筑空间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追溯了摩崖佛寺这一类型建筑的产生过程;结合巴蜀地区的历史文化背景,论述了巴蜀地区摩崖造像的历史源流及摩崖佛寺的建制。

关键词:巴蜀地区;摩崖佛寺;佛教的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TU09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329(2005)06-0021-05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liff-side Buddhist Temple in Ba-Shu Area

GUO Xuan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 Urban Plann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5, P. R. China)

Abstract: Cliff-side Buddhist temple is the latest form of Buddhist cave temple. It is the result of a change from close cave space to open cliff-side spac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ivil culture and local architectural system. This article inquires the origin of the cliff-side Buddhist temple as well as its formation in Ba-Shu area considering it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Keywords: Ba-Shu area; cliff-side Buddhist temple; localization of Buddhism

1 从石窟到摩崖

石窟寺最早产生于印度,是在山崖上开凿洞窟进行宗教活动的处所。古印度石窟寺主要有毗诃罗窟和支提窟两种型制,前者平面呈方形,内侧三面还有若干窟室供僧人静修坐禅之用;后者平面呈马蹄形,中心设塔(窣堵波的象征)用于僧人集会和礼佛(图1)。石窟寺随佛教传入中国后,受到中国本土文化和建筑体系的影响,在空间型制和外观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最终采取了在天然崖壁上直接雕刻佛像而不开洞窟的摩崖造像形式。其中一部分摩崖造像,尤其是规模、尺度宏大的造像完成后常常靠崖修建木构佛殿以保护佛像并提供宗教活动空间,从而形成了摩崖寺庙。

从石窟寺中最早出现中国木构建筑的特征到摩崖佛寺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1 中心塔柱式窟及其“木构建筑化”处理

在山崖上开洞窟并予以建筑手法的处理,从汉代的崖墓开始已具有悠久的传统。但在石窟寺中出现模仿中国木构建筑的处理手法,目前所知最早约始于北魏时期。中心塔柱式的石窟是北朝洞窟的典型形制,与印度支提窟属同一种类型,是供信徒绕塔右旋礼拜的场所。不同之处在于印度支提窟中塔的平面为圆形,而中国石窟中的塔柱统统变成了方形。在云冈石窟内很多方塔还雕凿出各层仿木结构的塔檐和柱枋斗拱,窟顶多用方形或长方形的平碁,这是早期石窟寺中出现的中国传统建筑的元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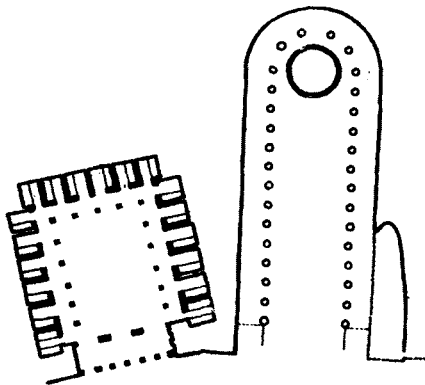


图1 典型的印度支提窟和毗诃罗窟
(引自萧默《敦煌建筑研究》P39)

* 收稿日期:2005-06-18

作者简介:郭璇(1975-),女,河南郑州人,讲师,博士生,主要从事建筑历史理论及历史建筑保护的研究。

公元五世纪末开凿的云冈第9,10窟,每窟的前室正面雕有两个大柱,如同三开间的房屋形式(图);六世纪前期开凿的麦积山石窟和稍后的天龙山石窟中有若干洞窟在前部开凿前廊,石窟在外貌上已经呈现出木构殿廊的形式。其中以完成于公元560年的天龙山16窟最为精美。此时,石窟在外观上对木构建筑的模仿已经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1](图3)。

1.2 佛殿式窟及木构窟檐

隋唐以后,随着佛像崇拜逐渐代替了佛塔崇拜以及佛教礼拜方式的转变,石窟的形制也发生了变化。用于禅定修行的毗诃罗窟和右旋礼拜的中心塔柱式窟逐渐消失了,佛殿式窟继而盛行起来。

在敦煌现存的隋唐石窟中,隋窟尚与北朝相似,多数有中心柱,但有些洞窟已将中心柱改为佛座;唐窟则绝大多数不用中心柱。初、盛唐时期盛行前后二室的制度,前室供人活动,后室供奉佛像;盛唐以后则改为单座的大厅堂,只有后壁龛容纳佛像,洛阳龙门奉先寺窟也属于此种类型(图4、5)。此类窟在平面上已经与木构佛殿的平面十分接近。莫高窟早期各窟前都应建有木构窟檐,这一点有洞窟外遗存的大量梁眼为证。窟檐是洞窟与外部的空间过渡,而且使石窟在外观上与木构殿堂更接近了^[2](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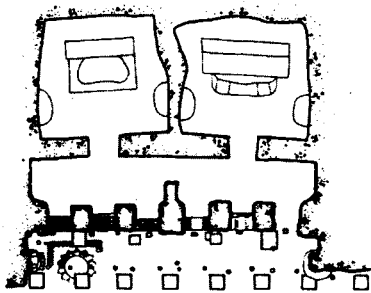


图2 云冈第9、10窟平面
(引自《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二, P368)



图3 天龙山第16窟外观
(引自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P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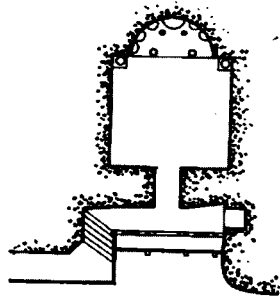


图4 莫高窟第444窟平面
(引自萧默《敦煌建筑研究》P279)



图5 龙门奉先寺窟平面
(引自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P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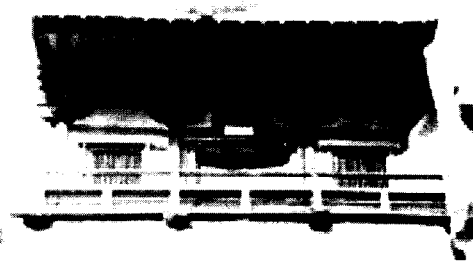


图6 莫高窟第444窟高檐
(引自萧默《敦煌建筑研究》图版 P40)

1.3 摩崖造像和摩崖佛殿

盛唐以后,随着佛教日益世俗化,狭仄的石窟空间越来越不能满足容纳更多信徒的要求。于是在天然崖面上造浅龛或直接雕凿造像而不开洞窟的造像形式——摩崖造像,日趋盛行并一直绵延繁荣至两宋。摩崖造像打破了窟龛型制的约束,便于利用大面积的崖面,或开凿巨大佛像,或雕刻叙述佛经中的故事情节,形成大型的道场群像。以佛教造像做为弘扬佛法的手段在这一时期发展到了极至。四川乐山、安岳,重庆潼南等处开凿的大像尺度之巨前所未有。宋代以后,重庆大足、合川等处还出现了由整体规划而形成规模宏大的佛教道场。另一方面,石窟在外观上模仿木构佛殿建筑的趋势越发显著,晚唐五代以后窟前接建木构建筑的作法更是广为流行。摩崖巨像或群像开凿后常建摩崖佛殿保护造像并提供宗教活动空间,从而形成以摩崖佛殿为主体的摩崖佛寺建筑(图7、8)。

摩崖佛寺虽然还保留着石窟寺的造像特征,但在空间上已经摆脱了洞窟空间的限制,在外观上更是

与木构佛寺建筑相差无几,摩崖佛寺是石窟寺发展到晚期进一步被木构建筑体系所同化的产物,也是佛教中国化和世俗化的结果。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从早期石窟寺到摩崖造像和摩崖佛寺的兴建所经历的几个历史阶段并不是截然割裂的。石窟寺在空间型制和外观上的演变过程也并非完全同步。比如

据郦道元《水经注》载,云岗石窟在北魏时期已是“山堂水殿,烟寺相望”,可见窟前木构建筑的修建和石窟寺在外观上有意模仿木构建筑的做法早就存在,而且颇具规模。而大足晚唐及宋代的摩崖造像里仍间或出现完全凹入的洞窟,说明洞窟式的空间型制并没有因为摩崖的盛行而完全消失。上述将石窟至摩崖在空间和外观上划分的三个发展阶段一是方便研究的需要,同时也是与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相一致的。

元代以后,石窟造像和摩崖佛寺的兴建由盛转衰。至明清,造像还陆续有所开凿,而摩崖佛寺除偶有新建外,多转入了重建重修的局面。

2 巴蜀地区摩崖佛寺历史源流及建制

2.1 巴蜀地区石窟寺的流变

2.1.1 巴蜀石窟造像的输入年代及传播路径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

历史上有多种传说,目前学界公认大致是在两汉之际;而传入的路线则有西域、南方海路和南方陆路三条路线^[3]。巴蜀地区的佛教造像早在东汉末年的崖墓中已经萌芽。佛教石窟寺造像则肇始于南北朝时期,繁荣于唐、宋,元以后逐渐衰落。广元石窟是目前学界基本公认的巴蜀地区开凿最早的石窟群,其开凿为隋唐以后巴蜀地区石窟造像的传播乃至繁荣准备了条件,而且其造像风格明显带有北方地区同时期石窟造像的特点。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佛教本身的传播密切相关。魏晋以来,佛教的传播呈现出很强的地域特点:南方重义理,北方重禅行。加之南朝和北朝在疆域上的分裂,以禅行礼拜为主的佛教石窟寺在南朝统治的地区自然难以得到发展。自公元504年起,北魏占领了今剑北地区,广元也就纳入了他的统治范围。这一时期广元以北北魏统治下的甘、陕等地开窟建寺之风已经十分炽盛,作为川北重镇的广元在这种影响下,石窟的开凿也就应运而生了。

广元石窟的开凿年代和风格为巴蜀石窟造像的源流提供了依据。巴蜀地区佛教石窟造像始于南北朝,并且曾经与中原北方的石窟造像有过密切的关系。隋统一全国以后,由甘肃、陕西入川的多条道路畅通无阻,佛教石窟造像沿着金牛道、米仓道、阴平道等主要交通路线向川中腹地传播,以处于军事、交通、经济上重要地位的州、郡为重点,再扩展至附近的各县区。至唐宋在富饶的四川盆地以内以及广阔的丘陵地区形成了东至忠县,南至宜宾、昭觉,西至邛崃、茂汶,北至广元、通江的石窟造像网络(图9)。

2.1.2 石窟向摩崖空间形制的转变 在巴蜀地区造像由北及南的传播过程中,石窟的型制逐渐发生了变化。

四川石窟中中心塔柱式窟很少,且几乎都分布在川北。广元皇泽寺第45号窟为中心柱式窟造像的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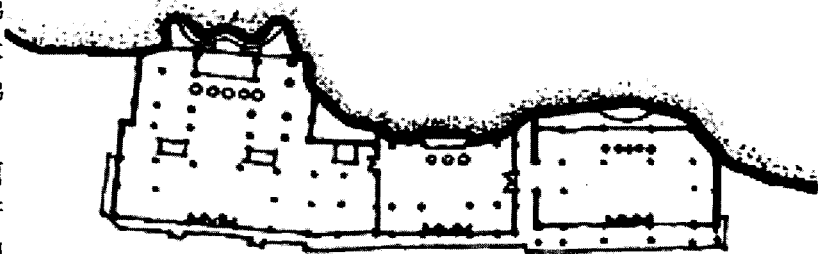


图7 典型的摩崖佛寺平面(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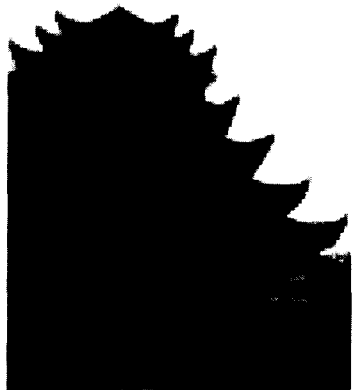


图8 摩崖佛殿外观(自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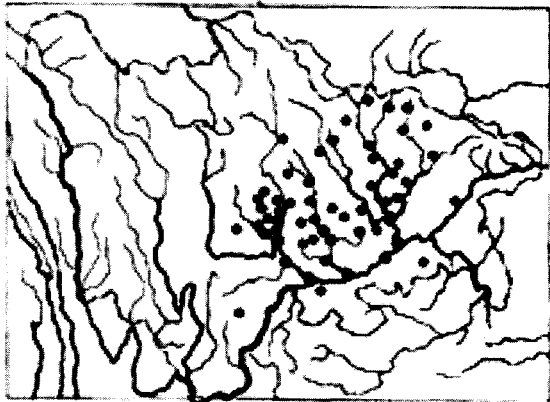


图9 巴蜀地区石窟及摩崖造像分布简图

引自《中国美术大系》雕塑篇12,P2)

表情则与敦煌北周第290号窟造像较为接近,此时的石窟型制和造像风格均带有较多的北方石窟的特征。从隋代开始广元石窟内出现了一种外方内圆的双重窟形,这种窟为方形敞口,正壁凿一圆形大龕,龕内设像,窟的进深较浅,已经开始表现出摩崖造像的特征。巴中、安岳、大足北山等地区的唐代石窟进深进一步变小,多为凿于悬崖上的浅龕。这些迹象表明巴蜀地区的石窟寺逐渐在向着摩崖的空间形制转变。

2.1.3 唐宋时期摩崖造像的繁荣 唐开元时期,巴蜀地区的石窟造像已形成了鲜明的特点,除广元千佛崖和皇泽寺有几个大窟以外,造像以浅龕居多。在乐山、安岳等地则出现了巨大的摩崖造像和体量庞大的摩崖佛阁。“安史之乱”以后,大唐帝国名存实亡,北方地区战争连绵,社会经济遭到了巨大的打击,失去了大规模开窟的诸多条件,石窟造像日渐衰落,而偏居西南一隅的四川地区由于社会生产则较少受到冲击和破坏,加之玄宗、僖宗先后驾幸蜀中,社会政治活动中心一再南移,大批文人雅士,高僧大德汇集,为晚唐以后的四川重庆地区摩崖造像的独步称盛奠定了基础。从晚唐至两宋,巴蜀地区摩崖造像不仅没有衰颓的趋势,反而涌现出新的高潮,继乐山、安岳之后又出现了多处巨型造像和有完整规划的道场群像,加之这一时期在外观上模仿木构佛寺的趋势日益明显,造像外接建木构建筑的做法广为流行,直接导致了巴蜀地区以摩崖佛殿为中心的摩崖佛寺的产生。

2.2 巴蜀地区摩崖佛寺的建制

2.2.1 摩崖大像的开凿 巴蜀地区摩崖佛寺的建制与巨型摩崖造像的开凿有着直接的关系。

从唐代开始,巴蜀各地即十分盛行建造高大佛像。摩崖造像由于具备利用天然崖面,开凿工程量小的优点,便于开凿尺度巨大的佛教造像。唐开元以后在四川乐山、安岳、重庆潼南等处开凿的大像尺度之巨前所未有,至宋代在重庆大足、合川等地又陆续出现了有整体规划的大规模佛教道场(即以一佛或几佛为中心的有整体规划的大型造像群)。

其中大型坐像主要分布在乐山大佛寺、荣县大佛寺、潼南大佛寺、江津石门大佛寺等处,道场造像目前发现的主要有合川涪滩二佛寺和大足宝顶佛湾两处。

巴蜀地区佛教摩崖造像的题材十分丰富,这与佛教诸宗在巴蜀的传布有着密切的关系。总的来说,在唐开元以前,四川石窟的题材内容与北方石窟基本一致:以弥勒净土为主题的大乘佛教的思想流行,造弥勒大佛之风盛行,四川乐山弥勒大佛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从开元至五代则大量出现了涉及净土、禅宗和密宗的造像;入宋以后出现了净土、华严、禅、密宗相涉,诸宗造像组合的题材,合川涪滩二佛寺和大足宝顶山佛湾造像均属此一时期的代表作品(表1)。

表1 四川、重庆地区主要摩崖大佛及佛寺的建制

摩崖佛寺及佛殿	所在地	造像题材	主像高	摩崖佛殿规模、型制	始、就年代	主持修建者
乐山凌云寺大像阁	四川乐山	弥勒坐像	71 m	13层楼阁(已毁)	像始凿于唐开元初(公元713年),就于公元803年,之后并建大像阁	僧海通募造
荣县大佛寺大佛阁	四川荣县	释迦牟尼坐像	36.67 m	初为10层楼阁(现为4层楼阁)	像始凿北宋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就于元祐7年(公元1092年)之后并建大像阁	僧德淳募修
潼南大佛寺大佛殿	重庆潼南县	释迦牟尼坐像,又名八丈金仙	18.43 m	初为5层楼阁(现为7檐歇山)	像始凿于唐咸通年间(公元860-874),就于北宋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次年建殿(公元1127)	道士王了知完成
合川涪滩二佛寺下殿	重庆合川市涪滩镇	禅宗道场	12.5 m	3檐歇山	南宋	不详
大足宝顶大佛湾大悲阁	重庆大足县宝顶	密宗道场千手观音	7.2 m	重檐歇山	像始凿于南宋淳熙元年至淳佑年间(公元1179-1252年),清代建大悲阁	僧赵智凤主持
江津石门大佛寺大佛阁	重庆江津市石门场	观音坐像	13.5 m	7檐歇山	明代	不详

2.2.2 “因佛成寺”与“因寺成佛” 摩崖佛寺的最初建制有两种情况,一种为“因佛成寺”。即摩崖佛寺的修建以摩崖造像的开凿为条件,一般是先造像后建佛殿,进而形成佛寺。另一种情况是“因寺成佛”,大佛开凿在原有寺庙的附近,佛像凿毕修建佛殿,使佛殿与原有寺庙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或者经过不断改建、扩建形成新的建筑格局。其中第二种情况比较多见。早在天宝年间,宜居乐山的岑参在

《登乐山凌云寺》一诗中对乐山大佛寺(又名凌云寺)已有这样的描述:“寺出飞鸟外,青峰载朱楼”。可见凌云山顶的寺庙建筑早于凌云大佛已经存在,而且颇具规模。大像开凿于开元年间,经90年至公元803年方告完成,之后建大像阁高13层,大像阁与山顶的寺庙建筑成为一个整体,凌云寺因为大佛所在,又名大佛寺。宋陆游有诗云:“不辞疾步登重阁,聊欲今生识伟人”,可以意会到当日大像阁的雄伟。可惜大像阁于明末毁于兵祸,未再修复,今仅存大佛两侧栈道和梁柱穴若干。

摩崖佛寺兴建到形成一定的格局通常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少则几十年,有时候甚至跨越了几个朝代。最典型的例子是重庆潼南大佛寺。潼南大佛寺所在的独立云峰顶原有寺院三重,名为定明寺,又称南禅院。寺内的大佛像始凿于唐咸通年间,但仅完成了佛首部分就停滞了。经过五代直至北宋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才由道士王了知集资鸠工续凿,经26年方成。南宋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开始建造大殿,才建一层后王了知去世,后又经寺僧德修与蒲智用踵其事,续建佛阁,经25年即绍兴辛未年(公元1151年)方才竣工。仅从大像的开凿到大佛殿的建成就跨越了唐五代和两宋的近三百年时间。宋代以后又陆续修建观音殿、玉皇殿、鉴亭等建筑才形成今天的格局。

2.2.3 明清以后摩崖佛寺的重建和修缮 摩崖佛寺的始建年代主要集中在唐至南宋,与摩崖造像在巴蜀地区的繁荣时期是基本一致的。元代以后四川地区遭到了战火的摧残,造像活动一蹶不振,元代造像至今很少发现,摩崖佛寺的修建也中断了,除明代偶有新建外,到清代摩崖佛寺建筑基本上已经进入了重建和修缮的阶段。现存摩崖佛寺建筑除凌云寺大佛阁在明末毁于兵祸,未再修复外,其余各摩崖佛殿都是清代以后重修的作品。我国现存各处的佛教寺庙,一般都经历修缮,以至寺庙的布局,殿堂的型制都与始建时有了很大的差别。特别是盛唐时期,寺庙中极其盛行楼阁式建筑和以高大楼阁为中心的布局方式,在今天的全国各地所存寺庙中已所存无几。但摩崖佛寺与一般佛寺的不同之处在于,当一般佛寺随着改朝换代,佛教由盛而衰毁灭殆尽的时候,摩崖佛寺虽也曾多次被毁,但与天然崖石同出一体的摩崖大像却得以千载保存,以至历代重修时,佛阁的选址、空间型制以及尺度规模与始建时尚有许多一致之处。在这一点上,摩崖佛寺建筑,尤其是摩崖佛殿,为研究我国古代建筑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是有着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和科学艺术价值的。

3 结语

摩崖佛寺是佛教石窟寺发展的晚期形态,也是佛教中国化、石窟寺中国化的产物。

巴蜀地区的摩崖造像最初曾与北方地区的石窟造像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安史之乱”以后,北方地区社会经济遭到了巨大的打击,石窟造像日渐衰落,而偏居西南一隅的巴蜀地区由于社会生产较少受到冲击和破坏,加之社会政治活动中心一再南移,从晚唐至两宋,巴蜀地区摩崖造像不仅没有衰颓的趋势,反而涌现出新的高潮,出现了多处巨型摩崖造像和有完整规划的道场造像群。这一时期石窟寺在外观上模仿木构佛寺的趋势日益明显,造像外接建木构建筑的做法广为流行,从而产生了许多以摩崖佛殿为中心的摩崖佛寺建筑群。

目前巴蜀地区尚遗存有佛教摩崖寺庙若干处:其中以四川乐山凌云寺、荣县大佛寺,重庆潼南大佛寺、合川涪滩二佛寺、江津石门大佛寺、大足密宗道场等处最具代表性。这为研究中国建筑发展史和研究地方建筑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和科学艺术价值。

参考文献:

- [1] 刘敦桢. 中国古代建筑史[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
- [2] 萧默. 敦煌建筑研究[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 [3] 李巳生. 四川石窟雕塑艺术[A]. 《中国美术大系》雕塑编12[C].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
- [4] 王剑平. 皇泽寺及石窟艺术[M]. 伊犁:伊犁人民出版社,2000.
- [5] 赖永海. 中国佛教百科全书(历史卷)[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6] 郭璇. 巴蜀摩崖佛殿空间类型及营建手法初探[J]. 重庆建筑大学学报,2004,26(4):5-11.
- [7] 郭璇. 巴蜀地区摩崖佛殿建筑结构构造特点探析[J]. 古建园林技术,2004,(82):33-40.